

世人争相说《聊斋》几人闻知《耳梦录》

蒲松龄的好友张贞也写过一部文言小说，名声为何远逊？

《渠丘耳梦录》(简称《耳梦录》)是清初山东著名文人张贞撰写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，现藏于安丘市博物馆。从体裁、笔法各方面看，与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(简称《聊斋》)非常相像。《耳梦录》，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(1709)；《聊斋》在蒲松龄生前已有抄本传世，乾隆十六年(1751)铸雪斋抄本是今存最早的一种。拿最早年代的《聊斋》抄本与《耳梦录》刻本比较，《聊斋》晚了42年。但按各自序言题识年份，蒲松龄又比张贞早30年。两部小说都是写鬼写妖，《耳梦录》成书又早，后来却难以与《聊斋》互相媲美。个中缘由，值得一说。



张贞画像

清康熙刻本《渠丘耳梦录》

□张漱耳

张公蒲公互相倾慕

《耳梦录》的作者张贞，字起元，号杞园，又号渠亭山人。是一位集儒学、文史经学和书画篆刻艺术于一身的博学鸿儒，与当时顾炎武齐名，有“南顾北张”之誉。他1636年生人，年长蒲松龄5岁。俩人都是生在明末，长在清初。

蒲松龄毕生热衷功名，自19岁初应童子试后，便屡试不第。直到71岁时才援例出贡，5年后便去世。张贞在康熙二十四年(1685)49岁时举博学鸿儒，诏试太和殿，御试第三名，授翰林院孔目，复征拜待诏，皆辞不赴任。可见，蒲松龄除了有部《聊斋》，从封建科举及其他艺术才能衡量，张公压蒲公一头。为了说明问题，不必方方面面列举对比了，说说俩人首次见面的情景，就明了了。

两位老先生是康熙四十年(1702)相识。是年初夏，张贞在济南造访挚友吴琯府上时，吴琯之子吴木欣引见张贞结识了吴的外甥、诗人朱缃。朱缃偶识张贞后仅数日，便盛邀他参加一个筵席。筵席上，张贞与蒲松龄首度碰面。原来，时蒲松龄早已是朱缃的知音，三月份他来济南参加科举乡试，就住朱缃家里，得到安排照顾。试毕朱缃在大明湖摆了一桌，致两位老者相见。

蒲松龄虽与朱缃结为契好，但毕竟他比朱缃大了30岁。酒席之上，同代人的蒲、张一见如故，二人高谈阔论，不住地倾心交谈，互有相见恨晚之意。甚至当着主人的面，都不乏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。这都难怪。张贞作为著名文人，学富五车，著作等身。尤其俩人都在写文言笔记小说，加上又有相似的际遇和身世，诸如都算“避世之士”，颇具狷介之气，性格耿直、愤世嫉俗……当然会有探讨不尽的话题。筵席间，张贞向蒲松龄出示自己去年才写的《明湖记》。结合现场实况，蒲松龄对文章所写的凄清意境，回味许久，觉得“余哀”缭绕。日暮分手归途中，因此次结识而兴奋得高一脚低一脚，几次滑倒泥泞路。回到寓所都意犹未尽，顾不得洗漱，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言古风《朱主政

席中，得晤张杞园先生，依依援止，不觉日暮，归途放歌》。两天后，蒲松龄又写诗赞颂张贞潇洒出尘：“谁者肖作湖海人，将无似我老张君。箬笠犹沾绿江雪，奚囊尽括青山云。游仙欲把浮丘袖，笑我双瞳小如豆。髯兮髯兮游何之，布袜行缠从而后。”

两部小说颇多近似

《耳梦录》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集，共收录安丘一地的奇闻逸事119篇。其中甲集28篇，乙集14篇，丙集28篇，丁集49篇。侧重史料，兼顾现实，基本囊括了古往今来流传渠丘的名胜古迹和名人逸事。史料部分从旧有的故事衍化而来；记述底层的平民百姓及状写鸡犬猪牛传闻(个别近乎荒诞)的现实素材来自百姓的口头传说，但是鲜有作者的亲身经历。这一点，不免令人遗憾。

本来，张贞绝意仕途后，和蒲松龄一样，长期生活在农村，应该有机会接触农民，体察他们的疾苦。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对底层百姓的压迫，以及自然灾害的袭扰，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。蒲松龄就自称《聊斋》是“孤愤之书”，《耳梦录》系乡里锁言、传闻逸事，必然反映农民的疾苦才是，可惜没有。偶尔有，也是间接涉及。如丙集《张命长》中，起首的“山翁怒大师曰，孝子张命长，山东安丘人也。壮为县吏，任侠，睹诸吏受赇多不法，知吏不可为，则弃刀笔归耕陇亩……”好在对自然造成的民生灾难毫不客气，没有刻意回避。如丙集《李氏》讲述的是因为康熙甲申大饥，落魄的丈夫孔玉奇，欲将妻子李氏领到邻县卖于男子。李氏得悉后，自绝饮食，丈夫百计劝诱无效，领到半路气已槁。丁集《牛瘟》记述康熙己丑牛瘟盛行，死者无算；丁集《沙鸡》记述康熙丙午，过沙漠之鸡，说有地震之虞。不想却是未几岁大饥至，人相食。邑人死亡流移者十之五六，说者以为不减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之惨。

从这些篇目看，《耳梦录》也不失为一部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。更不能否认的是，艺术上的成就与《聊斋》有极高的相似度，如都是篇幅有长有短。最短的如《郑牛》《鱼》，仅有8个字和10个字。叙之。

《耳梦录》的局限与不足

这样一本如此有近似度的古籍，却不能媲美《聊斋》，其社会影响、文学成就后来与《聊斋》拉开了距离。

原因有两大所限。一地之限和境遇之限。

本来，论社会影响，写鬼写妖他要先于蒲松龄，但119的篇幅又怎能与431篇可比？相差如此之大，盖因被“渠丘”限住了。他记得是一个县的奇闻逸事，试想，明末清初，渠丘能有多少人口？据安丘县志载，明万历十七年(1589)仅有19174户，46767人。明崇祯十五年(1642)后，战事不断，瘟疫流行，灾害饥荒加剧，不少地方十室九空。逢王一带(张贞隐居之乡)人烟几户灭绝。清康熙后，才见逃亡者回归。稀少的人间烟火，能产生多少有意义的故事？而《聊斋》就不一样了，人家那是放眼了大半个中国。

再说境遇。众所周知，蒲老先生是借花妖狐魅的故事来揭露社会黑暗，予以鞭挞和嘲讽。张贞对民间疾苦，仅是同情而已，至多把自然灾害暴露出来。对官场的黑暗，当局的昏庸，官匪的勾结，都不去冒犯揭露。为什么不能与蒲松龄一样？盖因两人的生存环境不一样。张贞有中举并授官的经历(儿子也考中举人)，中举比蒲松龄早，且每步都是一次通关。虽然归隐杞园，但名分在那里，还享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对举人的待遇，比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。你想，一点都没有切肤之痛之人，怎么会对科举制度予以批判？又怎么能站在人民立场上写出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呢？

文学创作如《红楼梦》之曹雪芹，如《聊斋》之蒲松龄，没有恶劣的境遇，即便立意很好，才分很好，他也写不出能够立世的不朽之作。

□雍坚

“济水自西南蜿蜒而下，其色碧且清，附城两岸多菜圃，王瓜坠地可折数断，土性之肥美可想而知矣。一时之达官富绅，名园别墅多卜地河畔。杨柳茂密如结翠幄，往来歌声与鸟语杂如笙簧。桥亘东西如驾彩虹。登桥远眺，见东南诸峰罗列如张翠屏，有山拔起，疑与天齐者，泰山也……”这是民国四年(1915)齐河县知事吴福森所写《大清桥沿革记并序》中的一段怀古之作。

吴福森没有见过大清河，也没有见过“其色碧且清”的济水(大清河)。在他写作此文前的60年——1855年，黄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，位于济南府长清县北店村(今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北店子村)与齐河县城(今齐河县祝阿镇)间的大清桥被滚滚洪水冲毁。大清桥地当九省通衢要冲，旧时官舆商辕，贩夫走卒来往不绝。清代康熙、乾隆下江南，也多次从此桥经过。

过去的大清河，水清且浅，河道也远没有黄河这么宽，济北两岸人民往来交通虽然也不是很方便，但尚有桥梁相通。由历城县、长清县的旧时辖区也可以看出，当年的大清河只是两县的一条过境内河。历城县在大清河北有清宁寺乡、马店乡等广大辖区，长清县在大清河北有济北乡、故河乡等广大辖区。

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，交通阻断，水患频发。不仅西北岸的齐河人发出“良辰美景付浩渺，世上再无大清桥”之慨叹，济南人也整体失去了北出通衢，历城、长清等县仿佛被一分为二，河北岸辖区恍如“飞地”，县太爷想要去视察一下，也得事先看好天气再找船工摆渡，十分不便。

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伴随着官堤民埝的逐年加高，黄河已经以地上河的形态“悬”于济南城北，对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形成严重威胁。美国旅行家威廉·埃德加·盖洛清末曾来济南游历，他在1910年出版的《中国十八省府》一书中曾经写道：“这儿(济南)跟中国多数地方一样，人口稠密，而且都挤在黄河边上。罗德岛每平方英里400人，比利时每平方英里589人，而山东则是每平方英里680人，黄河沿岸每平方英里1700人。60年前，黄河改道350英里。新河道有1英里宽，50英尺深，原是大清河的河道。由于淤泥堆积，河工们在黄河新河道的两边筑起高坝，洪水期黄河水位竟高出平原20英尺。河工们不能无限地加高堤岸，他们承认，20年内必须找到新办法，否则黄河会再次改道。黄河两岸稠密的人口正等待着一场灭顶之灾，疏浚显然是个良方。”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，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，2022年11月出版)

大河横亘催生木船摆渡

——济南黄河故事⑦



清末泺口摆渡船。